

# 大国博弈形势下中东欧国家与中国经贸合作方向分析

喻莎莎

(西南石油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成都 610500)

**摘要:**中美关系的合作与对抗已经成为影响国际格局的发展趋势的重要因素,两个大国的博弈是否会对中东欧等国经贸发展产生影响?本文运用 2009—2019 年中国与中东欧 19 个国家的进出口相关数据经济总量、进出口贸易总量、人均收入、对外投资净流量等,以及 2006—2015 年中美经贸摩擦案例数量和周期,基于引力模型下的回归方程检验分析中美摩擦对中东欧经贸合作的影响结果。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还是取决于双方经济总量的增长需求,中美间的摩擦目前并未有实证影响,“一带一路”政策也会积极推进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合作与双边贸易增长,双边进一步扩大合作能够改善中东欧国家整体收入水平。研究结果对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开展深度经贸合作关系的可能性提供了理论支持,证实了新国际分工格局下积极友好的政策关系能够促进国民经济和收入条件的改善及优化,中美贸易摩擦的确会对第三方贸易国家产生显著性有效影响。

**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F7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02-(2021)06-0025-09

## 一、引言

自 2015 年 6 月首届中国—中东欧博览会在宁波成功举办之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进入新一轮高峰期,中东欧板块成为中国连接“一带一路”国际市场的重要通道和交易平台。中东欧国家从地缘上包括 19 个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黑、黑山、马其顿、阿尔巴尼亚、乌克兰、摩尔多瓦、乌克兰。从经贸合作历史看,中东欧各国<sup>①</sup>的经济体制和市场依赖性依旧和西欧国家联系紧密,与西欧国家贸易量占其贸易总额一半以上,西欧国家和美国的历史性政治经济关系密不可分,但美国和中国分别作为当

今世界国际价值链分工布局中的技术掌握者和生产制造者,中东欧国家也参与了绝大数的中间产品制造和交易环节,中国和美国的摩擦也必然会影响他们的贸易价值和地位,特别是中东欧各国基本都是小国产业政策,对国家市场依赖性强,这种特殊的政治体制和经济结构使中东欧国家之间的产业政策战略性导向非常相似,对开放程度要求也非常高。新的技术带来了世界格局的改变,也促使贸易规则制度发生转变,由于各国参与价值链分工环节不同,中间加工产品及最终制品的市场需求也发生了巨大转变,作为新兴国家的中东欧国家市场和中国市场具有很强的互补性,2009 年时期中国与东欧国家的贸易总额为 390 亿美元左右,2011 年上升为 647 亿美

<sup>①</sup> 一般文献中东欧国家总数以 16 为准,把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多瓦排除。为了更好的研究“一带一路”带来的区域合作的完整性,本文则以中东欧国家地缘分布的 19 个国家为研究对象,因此贸易总额数据核算也以 19 个国家为基准。

收稿日期:2021-09-1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文化产业融合对我国地方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及政策选择”(U1404706)。

作者简介:喻莎莎(1984-),女,汉族,河南安阳人,经济学博士,西南石油大学教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

元,增幅高达66%。2012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波兰华沙召开了“中国—东欧国家经贸论坛”,对于扩大双边贸易合作规模达成了政治共识,双方贸易总量一直稳步增长,持续保持在5%~8%的速率。2015年的“一带一路”概念提出之后,双方进出口贸易总量突破了700亿美元,在2018年达到940亿美元,增幅达到44%。尽管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总量上升速度较快,但双方货物在各自国内市场的占有率普遍不高,2016年之后中国逐渐成为中东欧国家货物出口的主要目的地。无论是从政治交往角度,还是经济合作角度看,2018年来中美间频繁发生的贸易摩擦是否会影响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未来经贸合作的方式值得研究。

## 二、研究综述

中东欧国家无论在经济总量还是政治影响力上都难以和中美抗衡,具有小国思维模式,而在大国发生冲突与对立时,小国的战略选择对大国来说更为重要。小国的追随倾向源自实力弱小,追随的对象一般选择临近的强国,这样可以改变它的优势,避免成为强国早期扩张的牺牲品。但也有学者持相反态度,认为在大国竞争局势不明朗时,小国不会承担过度依赖或得罪另一方的危险,甚至小国不仅不会与崛起国结盟,还会和主导国一起对崛起国进行遏制。尽管小国的战略选择不同,但对于大国而言,如何争取小国的支持和合作也是非常重要,特别是当小国处于优势地理位置,或者具备优势资源,也是能影响大国在国际市场话语权的關鍵所在。

关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的研究,已经有很多学者从政治合作、产业分布结构、贸易加工、价值链分工体系等角度开展了研究,Anastas&Dragan(2019)<sup>[1]</sup>认为中东欧国家在受到中国的政治影响下有意向缩减与西欧国家集聚效应,选择与中国建立更好的政治经济合作关系。Garlick(2019)<sup>[2]</sup>则认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频繁合作影响了欧洲整体经济实力发展,使欧洲经济产生分裂,但并没有发现具体证据可以证明分裂的存在。Ondrias(2018)<sup>[3]</sup>认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平台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项目,更多的是中国软实力在欧洲地区的扩张表现。Herrero(2017)<sup>[4]</sup>认为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会降低中欧之间的运输交易成本,但是欧盟国家受益要小于亚洲国家的受益。Shang YH(2016)<sup>[5]</sup>认为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合作主要集中在中间产品竞争力上,相互的进口需求仍然具有增长的潜力。1980—2018年,中国与中东欧国

家共结对169对友好省州(城市),凸显了明显的地域合作特征,而中欧班列的开通以及线路的丰富化更好的促进了双边贸易数量的增加,但美国在中东欧国家的地缘政治作用也不可忽略,特别是防务和能源合作决定了其政治依赖方向。谢国娥(2018)<sup>[6]</sup>使用突变级数法对东南亚和中东欧国家的投资环境进行了比较,发现东南亚在对外开放水平和劳动力可得性上明显优势,中东欧与中国的合作仍然具备较大潜力,但需要进一步加深了解和合作。匡增杰(2019)<sup>[7]</sup>使用泊松伪极大似然方法对影响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潜力的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两者合作潜力较大,积极促进因素较多。赵书博(2019)<sup>[8]</sup>分析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税收制度,强调了我国推进贸易深入需要进一步简化税率,也说明了两者间经贸合作过程中所面临的规则制度障碍较大。王灏晨(2019)<sup>[9]</sup>提出,中东欧国家产业结构升级中最需要的是人才资本的投入。邓靖(2019)<sup>[10]</sup>通过对贸易竞争、贸易互补、贸易密度等指标的实证检验,得出中国加深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可以优化其贸易环境,提升欧盟经济体的综合实力。袁其刚(2019)<sup>[11]</sup>通过中国对中东欧11个国家投资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中国企业在投资过程中更多考虑的是收益性而非政治稳定因素。

尽管很多学者对中国与中东欧经贸合作发展做了相关理论和实证分析,但随着国际形势的转化,中美关系逐渐紧张,双方互相征收高关税已经对国际中间产品的加工和制成品组装等分工布局产生了辐射性影响,这种冲突是否影响到了中东欧经济发展,尚未有学者对其开展实质性研究,这也是本文研究的创新点所在,有学者认为中国和美国仍然不是东欧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其进出口总量变化不能对东欧经济产生显著影响,笔者认为当前全球价值链体系的深入程度已经超出了以往任何时期,每一个国家的工业生产结构都和国际局势息息相关,中美贸易战的开始一定会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每一位成员国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欧盟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也不能独善其身,中东欧经济体作为新兴市场的代表以及欧盟组合中“东大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不能从贸易争纷中完全剥离出来,更需要寻找新的市场资源和新的机遇实现经济体制的转型。

## 三、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发展现状

### (一)“修昔底德陷阱”的说法

中美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总体,无论政治力量、军事力量、经济实力存在着对立和并存的

局面,两者的贸易合作和贸易摩擦对其他经济体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两种不同体制国家的实力对抗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还是保持价值链制造高低不同层次的分工合作模式,都是全球经济发展参与者的关注点。2017年美国对中国再次启动“301”调查并以加征高关税拉开了中美摩擦的序幕,随后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签署备忘录,开始了中美贸易的关税战,也意味着国家要素市场以及国际分工格局面临着再分配、再布局的问题,价值链的加工环节也会随着贸易保护趋势加强而发生转移。根据目前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增长速率,中国有极大的可能性会在未来10年到20年间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并主导新价值链分工体系,这也是美国全力遏制中国发展的重要原因。从要素禀赋上看,美国仍然是保持资本密集要素优势产业,但美元的高发行量导致“新特里芬两难”问题,使美国国家信用地位不断下滑,同时缺乏产业生产的基础动力使美元的价值体系地位有所动摇,这将直接影响美国的要素优势。而中国则是借助低成本劳动力土地资源要素优势长期依赖于美国出口市场形成了外生性发展动力,缺乏内生性创新驱动动力。这种不平衡模式影响着两国经济长远合作,也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对中美合作的历史态度上,中东欧国家有部分是转型经济体的代表,多数体制是议会制共和制,货币体系也和欧元区联系紧密,历史文化背景的相似性、体制的相通性使这些国家在选择经贸合作伙伴时也会倾向于欧洲,例如,东欧国家向德国市场出口比重最高,俄罗斯其次,对中国和美国出口比重较低。但有趣的是,中美两国从东欧国家进口的商品具有高度重合性,集中在技术含量较高的机电产品、运输设备等资本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同时中国还会进口一部分木制品、纤维素浆及纸张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中东欧国家在未来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会发挥怎样的资源优势,参与到新价值链体系当中?中美紧张局势是否会影响中国和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是能够催化并加速两者间市场融合,还是会产生负影响作用?笔者认为归根结底,还是要看经贸合作带来的福利分配是否合理,是否能让本国居民受益是中东欧国家考虑的本质。

## (二)中国与中东欧的经贸合作预测

有关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合作预测很多学者已经做了前期研究,尚宇红(2013)<sup>[12]</sup>曾经预测两者在2015年能够实现贸易额1000亿美元<sup>①</sup>,同时

也指出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的贸易顺差严重,产品结构集中于机械及运输设备,贸易依赖度过低等问题。施本植(2016)<sup>[13]</sup>通过产品相对贸易指数等测算,认为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和市场存在互补,而非竞争,但贸易竞争力不强。这一点和张秋利(2013)<sup>[14]</sup>研究结论一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互补性存在于产业间而非产业内,缺乏技术交流和资本投资,通过“一带一路”政策带来的资本等要素的流动可以促进国际分工的纵向发展。燕春蓉(2019)<sup>[15]</sup>对中国和中东欧各国的贸易互补性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分析: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强劲优势,阿尔巴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国和中国的产品竞争性较小。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在资源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上的竞争性很低,存在较大的贸易潜力。

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需要更多的力量推动,不仅仅是政府层面的政策引导,也需要企业投资、文化交流、商品展会等各种层次、各类团体的互通互利,两者的市场存在很强的互补性,同时中国和东欧国家都处于产业升级、新旧市场的转型时期,中国需要更大的市场和资本输出的平台,东欧国家需要更多的出口消费力和基础设施完善建设,如何加强两个地区的经贸合作,增强贸易依赖性,有利于促进各国经济总量上升和资源效率。

## 四、研究模型

本文选取了中东欧19个国家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数值作为主体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Fuchis&Wohlraabe(2005)通过引力模型和面板数据测度了欧盟新成员的加入对欧盟经贸潜力的积极影响。来源于Anderson(2003)的引力模型是大多数学者研究双边贸易变化趋势的基础模型,如下(1)所示:

$$T_{ij} = \frac{GDP_i GDP_j}{D_{ij}} \quad (1)$$

其中, $T_{ij}$ 表示贸易进出口单边总量, $GDP_i GDP_j$ 表示贸易双方的经济总量, $D_{ij}$ 表示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东欧国家的地理位置距离很近,几乎相互接壤,在连接中国和欧洲的位置上也非常集中,本文不再考虑地理因素对双边经贸关系的影响。主要考虑中美摩擦发生的时间节点对中国和东欧国家的影响,中美摩擦数据来源于Bown创立

<sup>①</sup>根据海关总署统计结果显示,“16+1”贸易总额2015年未达到1000亿美元,2017年进出口总额为679.8亿美元。

的“临时性贸易壁垒数据库”(TTBD)。考虑中东欧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还是集中于西欧地区,中美贸易影响相对较小,为保障检验的准确性和有效性,而中美关系的摩擦存在诸多不定因素,贸易摩擦的表现是中美双方发起争端的反倾销事件和反补贴事件,这类争端事件会对中国的贸易出口总量产生直接影响,为了更好的衡量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影响,在模型中使用中国的贸易总量以进出口数额与中美贸易发生摩擦的案例数量做交互项变量,提高中美贸易摩擦变量检验的准确性。

同时加入主体控制变量,即中国和东欧国家的经

$$Dis_{uct} = \theta_1 \Delta Number_{uc(t-1)} + \theta_2 LnChinatrade_{it} + \theta_3 \Delta Number_{uc(t-1)} \cdot LnChinatrade_{it} \quad (3)$$

通过对各原始变量的对数处理,  $\mu_{ijt}$  为预测误

$$LnT_{ijt} = \alpha_{ijt} + \beta_1 LnGDP_{it} + \beta_2 LnGDP_{jt} + \beta_3 Dis_{uct} + \beta_4 LnFDI_{ijt} + \mu_{ijt} \quad (4)$$

由于中东欧国家数量较多,每个国家体制和优势产业略有差别,有 11 个国家已经加入欧盟,5 个国家为欧盟候选国,为了进一步分析欧盟是否会因为中美关系对中国经贸合作关系发出不一样的信

$$LnT_{ijt} = \alpha_{ijt} + \beta_1 LnGDP_{it} + \beta_2 LnGDP_{jt} + \beta_3 Dis_{uct} + \beta_4 LnFDI_{ijt} + \beta_5 EU + \mu_{ijt} \quad (5)$$

中东欧国家大多数都是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国家,国民经济收入是衡量经济发展平稳需求的重要因素,在制定贸易政策或选择贸易合作伙伴时也

$$LnGDP\ per\ capita_{it} = \alpha_{ijt} + \beta_1 LnExport_{ijt} + \beta_2 LnImport_{ijt} + \beta_3 Dis_{uct} + \beta_4 LnFDI_{ijt} + \mu_{ijt} \quad (6)$$

## 五、分析结果

研究使用 STATA14.0 对 2009—2018 年中国与中东欧 19 个国家 190 组 16617 个样本数据做检验分析。首先对基础数据进行对数转换,进行平稳性和协整性检验<sup>①</sup>。

表 1 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分析—基于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

	OLS 检验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随机效应模型	
	CEE 进口	CEE 出口	CEE 进口	CEE 出口	CEE 进口	CEE 出口
CEE GDP(19)	1.11 (13.39***)	0.998 (16.69***)	0.874 (2.82**)	0.742 3.62***	1.173 7.97***	0.963 9.01***
中国 GDP	1.044 (1.72*)	0.074 (0.17)	0.894 (3.61***)	0.199 1.22	0.971 (3.93)	0.252 1.56
中美贸易争端数量	-2.92 (-1.04)	-1.09 (-0.54)	-0.683 (-0.61)	-0.224 -0.3	-0.959 (-0.84)	-0.361 -0.48
中国总贸易额	-1.00 (-0.71)	0.302 (0.3)	0.511 (0.82)	0.587 1.43	0.158 (0.27)	0.366 0.96
贸易争端交互项	0.1 (1.04)	0.038 (0.54)	0.023 (0.538)	0.007 0.31	0.033 (0.84)	0.013 0.49
FDI 净流出	0.186 (3.2**)	0.043 (1.04)	0.002 (0.07)	-0.026 -1.28	0.01 (0.32)	-0.025 -1.26
EU 成员国	-0.367 (-2.04**)	0.638 (4.91***)			-0.052 (-0.14)	0.875 3.14**

① 平稳性和协整性检验结果均通过  $p < 0.1$  条件下的显著性水平。

济总量,中东欧各国对外投入资本总量,数据来源于 Word Bank 数据库。基础研究模型如下(2)所示:

$$T_{ijt} = f(X_{ijt}, Dis_{uct}) \exp(\mu_{ijt}) \quad (2)$$

其中,  $T_{ijt}$  为 2009—2018 年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单边进出口贸易额,  $X_{ijt}$  为各时期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所对应的控制变量,  $Dis_{uct}$  为中美争端变量,因为贸易摩擦措施从发起争议到执行一般都有一个周期,其对贸易的影响也会产生时滞性,所以数据选取 2007—2015 年间发起的争端案例数量和周期长度,同时对案例数量做一阶差分处理,对贸易争端的处理周期也作为参考变量选择。如下式(3)所示。

模型转化为如下(4)所示:

号,本文将加入欧盟与否也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加入模型,取虚拟变量值,加入欧盟的国家值为 1,非欧盟国家为 0,模型如下(5)所示:

会考虑是否能够提升国民收入水平,因此,基于这一角度将国民收入做为因变量,分析中国的经贸合作是否能够有效改善国民福利,模型如下(6)所示:

### (一)中美贸易摩擦下中国与中东欧的经贸发展分析

在进行 OLS 回归检验之后,再经过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下的回归检验,分析结果如下表 1 所示。

续表:

	OLS 检验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		随机效应模型	
	CEE 进口	CEE 出口	CEE 进口	CEE 出口	CEE 进口	CEE 出口
F-value	77.89***	136.3***	26.56***	65.18***	234***	237***
R <sup>2</sup> value	0.799	0.875	0.77	0.835	0.78	0.879
Constant	-13.3	-15.94	-43.49***	-19.99**	-42.9***	-21.04**

注:\*, \*\*, \*\*\* 分别表示 t 值在 10%, 5%, 1%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从结果可以看出,中东欧国家的经济总量发展和其进出口贸易还是有显著的正相关联系,且系数都近似于 1。中国的经济总量仅在固定效应模型下对中东欧国家的进口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在稳健性检验中,中国经济总量促进作用的显著性更明显。中美贸易摩擦和纷争数量对中东欧国家的进出口贸易的相关性虽然不显著,但其系数关系均为负数呈现,一方面证实了理论上小国贸易对大国博弈局势的反应性不强,不如经济和贸易增长的影响作用强,但负系数还是说明了中美的贸易摩擦对中东欧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不利,经过对中美贸易摩擦和中国贸易总量等变量做交互项处理之后,中美贸易争端对中东欧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系数变为正值,但系数值明显变小,最大值为 0.1,说明基于中国贸易输出总量来说,中美贸易摩擦对中东欧的贸易合作影响还是较小,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潜力较大,

仍然取决于双方的战略合作方向是否一致。从经贸合作的联盟商看,欧盟成员国的检验系数均为显著影响,但对中东欧从中国的进口贸易呈现负系数,和之前分析的中东欧国家对欧盟的依赖性更强,而中东欧国家中欧盟成员国的出口贸易却呈现出显著正相关,且增长率为 6.38%,说明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对中国的出口需求依赖性更大,所有的模型拟合度都超过了 75%,说明中美摩擦和控制变量对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经贸关系的解释度较高,但中东欧国家的对外投资却没有表现出对经贸关系的显著性影响作用。从外,通过对中东欧国家的对外投资净流出分析看,其对中国和中东欧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影响不稳定,需要进一步进行检验。

为了进一步证实模型的有效性,采用稳健性检验对模型分析再进行优化,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表 2 进出口贸易稳健性影响分析

	稳健性检验(1)					
	CEE 进口	CEE 出口	CEE 进口	CEE 出口	CEE 进口	CEE 出口
CEE GDP(19)	1.17 (9.33***)	1.12 (10.24***)	1.19 (9.26***)	0.98 6.53***	1.19 (8.57***)	0.977 (6.21***)
中国 GDP	1.14 (5.63***)	0.43 (4.25***)	1.14 (5.60***)	0.44 (4.31***)	1.00 (3.60***)	0.438 (1.76**)
中美贸易争端数量	0.001 (0.59)	0.000 (0.22)	0.001 (0.62)	-0.000 (-0.06)	0.002 (0.79)	0.002 (1.48)
FDI 净流出	0.01 (0.43)	-0.024 (-1.6)	0.01 (0.41)	-0.026 (-1.78)	0.01 (0.41)	-0.026 (-1.70)
EU 成员国			-0.08 (-0.19)	0.838 (2.13**)	-0.79 (-0.19)	0.86 (2.05**)
中东欧展览会					0.113 (1.08)	0.092 (1.21)
“一带一路”					0.013 (0.12)	-0.052 (-0.56)
F-value	146***	149***	150***	176***	157***	227***
R <sup>2</sup> value	0.78	0.84	0.78	0.88	0.78	0.88
Constant	-43.74***	-19.19***	-44.01***	-16.8***	-40.13***	-16.37***

注:\*, \*\*, \*\*\* 分别表示 t 值在 10%, 5%, 1%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为了更好地分析各个控制变量的影响效果,以模型(1)为基础,进行变量的逐渐添加进行 Robust 检验。中国的经济总量影响显著性加强,对中东欧国家的进口影响系数均超过 1,出口影响系数在 0.5 左右,说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发展还是和中国经济发展联系紧密,双方相互依存。中美贸易冲突的系数值变小,但负相关已经不明显,说明中美经贸摩擦在近期内对中东欧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关系仍然存在绝对性或直接显著影响,但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周期以及关税壁垒的增强,中国对中东欧贸易的趋势仍不好判断。在加入不同时间节点考虑因素之后,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进出口总量影响显著性有所变化,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经贸关系两个重要时间转折

点是 2011 年举行的中国—中东欧博览会,以及 2015 年中国政府提出了“一带一路”提案等两次政策鼓励,结果显示,博览会的召开并未对中国及中东欧国家的双边贸易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但相关系数均为正值,“一带一路”的提出对中东欧国家的进口贸易产生了相关系数为正的积极推动作用。对外投资净流出和“一带一路”政策对中东欧国家的出口贸易的影响系数均为负值,存在中东欧国家的对外投资效应不理想的原因,有待进一步再检验。

为了使模型检验结果更加准确,进一步使用 GEE 模型、MLR 效应模型、广义线性模型 XTGLS 检验各变量影响效果,分析结果如下表 3 所示。

表 3 进出口贸易稳健性影响分析

	稳健性检验(2)					
	CEE 进口	CEE 出口	CEE 进口	CEE 出口	CEE 进口	CEE 出口
CEE GDP(19)	1.18 (7.46***)	0.96 (8.91***)	1.29 (33.98***)	1.02 (54.09***)	1.34 (19.22***)	0.97 (19.53***)
中国 GDP	1.02 (3.49***)	0.45 (2.64**)	0.622 (5.54***)	0.43 (4.26***)	0.89 (4.69***)	0.272 (2.27**)
中美贸易争端数量	0.002 (0.64)	0.002 (0.87)	0.001 (0.53)	0.000 (-0.14)	0.003 (2.19**)	0.001 (1.76*)
FDI 净流出	0.008 (0.25)	-0.027 (-1.48)	0.004 (1.99**)	0.003 (2.04**)	0.001 (0.39)	0.001 (0.51)
EU 成员国	-0.06 (-0.15)	0.89 (3.02**)	-0.17 (-2.4**)	0.726 (30.09***)	0.023 (0.12)	0.81 (5.33***)
中东欧展览会	0.11 (0.74)	0.089 (1.05)	0.256 (4.45***)	0.025 (0.49)	0.037 (0.50)	0.08 (1.85*)
“一带一路”	0.01 (0.09)	-0.56 (-0.89)	0.12 (2.9**)	-0.032 (-0.92)	0.057 (1.01)	0.02 (0.59)
Wald chi2(7)	213***	238***	2402***	6743***	684***	748***
Constant	-40.26***	-16.23***	-30.85***	-17.53***	-40.23***	-11.79***

注:\*,\*\*,\*\*\* 分别表示 Z 值在 10%,5%,1%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因 Robust 稳定性检验已经对各变量的影响方向做出了判断,故检验过程中仍然依据最终模型对所有控制变量及因变量进行有效性判断。结果表明无论在什么条件下,贸易双方的经济总量的增长都会有利于双方经贸合作深度发展,这也是我国不断要求加快产业转型发展,寻找内生创新驱动力的重要原因,中美贸易的争执和纠纷数量或周期目前还未能产生改变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模式的实质性影响,相比之下,欧盟对中东

欧国家的政策选择影响更为显著也更有积极促进作用,因此,中国需要加强和欧盟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合作意识和力度,中国与欧盟的良好经贸往来有助于中东欧国家在选择战略联盟时向中方倾斜,有助于中国“一带一路”市场的稳固和长远发展。同时,“一带一路”政策在检验过程中也出现了显著性的效果,但并不稳定,这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时间周期仅有 3 年(2015—2018)有关,未来长远看,“一带一路”政策对中东欧的经贸发展一定会产生有效的推动力

量,中东欧国家的对外投资也会产生积极效应。

(二)中美贸易摩擦对中东欧人均收入的影响

从国家福利角度看,中国和中东欧的经贸关系如果能够积极提升国民收入水平,才是双方政府能

够积极持续推进合作的根本所在。因此,模型再选择 2009—2018 年间中东欧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检验,基于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以及稳健性检验结果如下表 4 所示。

表 4 经贸合作对人均收入水平的影响分析

	OLS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Robust 检验	GEE 检验
CEE(19)进口	-0.054 (-1.68*)	0.056 (4.05***)	0.051 (3.75**)	0.05 (2.02**)	0.05 (3.82***)
CEE(19)出口	0.064 (1.53)	0.076 (3.66***)	0.069 (3.38***)	0.069 (3.14**)	0.068 (3.45***)
中美贸易争端数量	-0.001 (-0.15)	-0.000 (-0.70)	-0.000 (-0.71)	-0.000 (-1.61)	-0.000 (-0.73)
FDI 净流出	-0.000 (-0.01)	-0.000 (-0.49)	-0.000 (-0.43)	0.000 (-0.46)	-0.000 (-0.43)
EU 成员国	-1.03 (13.61***)	—	0.85 (4.66***)	0.848 (4.95***)	0.849 (4.86***)
中东欧展览会	0.08 (0.8)	0.015 (0.78)	0.019 (1.04)	0.02 (1.35)	0.02 (1.07)
“一带一路”	0.14 (2.25**)	0.11 (9.97***)	0.11 (10.13***)	0.11 (6.36***)	0.11 (10.36***)
F-value	61.58***	53.21***	351***	166***	368***
R <sup>2</sup> value	0.73	0.26	0.67	0.67	—
Constant	7.93***	6.21***	5.96***	5.96***	5.96***

注:\* , \*\* , \*\*\* 分别表示 t 值在 10% , 5% , 1%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GEE 检验结果下\* , \*\* , \*\*\* 分别表示 z 值在 10% , 5% , 1%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结果显示,中东欧国家的人均收入上,“一带一路”发挥的作用更为显著,无论是 OLS 检验,还是固定效应、随机效应下的检验,以及 Robust 检验和 GEE 检验结果都对“一带一路”因素通过 1% 水平下的显著性得到一致结论,但从模型的拟合度看,在固定效应模型下,欧盟成员国因素被遗漏的情况下,拟合度只有 0.26,而其他考虑欧盟成员国因素的模型拟合度达到 0.67,说明欧盟成员国的身份还是会积极改善中东欧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总体拟合度不

高也说明影响中东欧国家的收入也不仅仅是外部因素,内部因素的影响作用更大,所以中东欧国家在争取外部合作和发展的同时,也需要对国内产业结构和生产驱动要素进行改革,增强市场经济活力,改善居民就业条件。中美贸易摩擦的因素未对中东欧居民收入产生实质性影响,和贸易总体情况一致,因此,中国需要加强和欧盟国家之间的合作,缩短贸易距离,尽可能使双方大国的合作福利改善沿途国家的经济生产条件和居民收入水平。

表 5 人均收入水平影响的稳健性分析

	Xtgls(2)	Xtgls(1)	Xtgls(3)
CEE(19)进口	-0.052 (-21.98***)	-0.034 (-3.09**)	0.01 (0.85)
CEE(19)出口	0.06 (17.87***)	0.034 (2.67**)	0.025 (1.83*)

续表：

	Xtgls(2)	Xtgls(1)	Xtgls(3)
中美贸易争端数量	0.001 (0.87)	-0.000 (-0.81)	-0.000 (-1.81)
FDI 净流出	-0.000 (-0.42)	-0.001 (1.41)	-0.000 (-0.88)
EU 成员国	1.03 (268***)	1.04 (29.24***)	1.00 (21.87***)
中东欧展览会	0.09 (5.08***)	0.05 (1.63)	0.023 (1.84*)
“一带一路”	0.123 (11.66***)	0.15 (8.09***)	0.05 (4.81***)
Constant	7.96***	8.17***	7.64***

注：\*，\*\*，\*\*\* 分别表示 z 值在 10%，5%，1% 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

为了结果的准确性，也对人均收入模型进行广义回归检验，结果和表 4 的结论基本一致，在不考虑政治政策引导因素情况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量都会对提升人均收入产生积极影响，显著水平均在 1% 左右。对外投资虽然在经贸关系上没有产生理想的促进作用，但是还是能够改善中东欧国家居民收入。考虑政策因素在内的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中美贸易摩擦虽然不利于中国贸易整体发展，但是对中国对中东欧国家的进出口贸易还是会产生积极影响，并且进一步提升中东欧国家人均收入水平。这个结果对中国开拓东欧国家合作贸易给予了积极的政策信号，同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分析结果表明 2015 年之后人均收入水平受政策影响明显，且显著性水平在 1% 左右。同时，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也会明显上升，预计 5 个欧盟候选国正式加入欧盟的可能性很大，中国更需要加强和与中东欧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建立广泛平台和通道加深和欧盟各国的经济合作层次。

参考文献：

- [1] Anastas vangeli, Dragan pavlicevic. 2019. Introduction: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relations[J]. Asia Europe Journal, 17(4): 361-368, <http://doi.org/10.1007/s10308-019-00560-4>.
- [2] Garlick J. 2019. China's Economic Diplomacy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 Case of Offensive Mercantilism? [J]. Europe-Asia Studies, 71(8): 1390-1414, <http://doi.org/10.1080/09668136.2019.1648764>.
- [3] Ondrias. 2018. Issues facing China's soft power in the 16+1 Platform, Economic annals-XXI(172): 22-27, <http://doi.org/10.21003/ea.V172-04>.
- [4] Herrero AG. 2017.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an Europe Expect Trade Gains? [J]. China & World Economy, 25(6): 84-99, <http://doi.org/10.1111/cwe.12222>.
- [5] Shang YH, Ponikvar, Kejzar. 2016.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China-CEE Trade[J]. Europe-Asia Studies, 68(9): 1486-1505, <http://doi.org/10.1080/09668136.2016.1244259>.
- [6] 谢国斌、许瑶佳、杨逢珉，“一带一路”背景下东南亚、中东欧国家投资环境比较研究[J]. 世界经济研究，2018(11): 89-98+

## 六、结论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际分工价值链体系的转变，中国和美国在生产要素的主动权优势把握上分歧较大，也催生了一些系列经济贸易摩擦和政治紧张与对立，但几十年的经贸合作关系使中美双方已经产生密不可分的市场依赖性，无论是加征高税率关税还是新自由贸易协定圈的建立都会对彼此的经济体制产生重大影响，对于中东欧国家而言，西欧经济的衰退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如何开发新兴市场刺激国内生产促进新的经济循环是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中国市场无论是在政策上、地理位置上、产业结构上都存在正向趋势的互助性和互补性，对增强国家经济实力、提升国民收入都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基于中国与中东欧的经贸数据实证分析也证实了这一观点，但研究方法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对政策影响力的分析，可以进一步采用 DID 差分分析法，更好的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的开放经济体制产生的作用。



- [7]匡增杰、高军,“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潜力研究[J].统计与决策,2019,35(13):122—124.
- [8]赵书博、张书慧、张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值税比较研究[J].管理世界,2019,35(07):104—115.
- [9]王灏晨,对中东欧国家开展创新投资的机遇与挑战[J].中国物价,2019(10):20—22.
- [10]邓靖、李敬,贸易竞争、贸易互补与贸易环境—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合作的实证检验[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9,21(03):47—56.
- [11]袁其刚、郜晨,中东欧国家投资的政治风险研究[J].经济与管理评论,2019,35(05):149—161.
- [12]尚宇红,2001—2011年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货物贸易结构分析[J].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13(01):80—87.
- [13]龙海雯、施本植,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贸易竞争性、互补性及贸易潜力研究—以“一带一路”为背景[J].广西社会科学,2016(02):78—84.
- [14]张秋利,中国与中东欧国家货物贸易互补性研究[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6(03):111—115.
- [15]燕春蓉,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中东欧的贸易发展研究——基于产品的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视角[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03):113—118.

## Analysis on China—CEE Countrie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Under Great Power Games

YU Sha-sha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engdu 610500, China)

**Abstract:** Sino-US trade friction has lasted for several years and has become the developing trend for the new international pattern. The game between two larger nations would affect CEE countries' trade conditions. This paper used panel data of economic aggregate, total volume of trade pattern, per capita income, and foreign investment net flow etc factors of China and CEE countries during the period of 2009—2019, also used the data of trade friction between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from 2006 to 2015. Analyzed by gravity-model to measure the influences among these time perio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EE still depends on the economic gross growth on both sides, the friction between Sino-US has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s, China would like to establish much stronger relationship with CEE countries, in additional,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promote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trade amount between these nations positively, and improve the whole national income level. These results has supported the strategies that asking for depth and width economic cooperation with China, confirmed that positive and friendly policy can promote national economic and income level instead of protectionism. The Sino-US trade friction exactly has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the third trading partner, based on this perspective there are more extensive and useful research can do.

**Key words:** Sino-US trade frictions; CEE countries;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责任编辑:戴 燕)